

- 智是知得到，圣是行得到
- 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
- 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
- 孔子圣人，其学必始于观书
- 故作轩窗挹苍翠，要得弦诵答潺湲

文人的閱讀 與文的閱讀

徐雁 ■ 著



科学出版社

文人的閱讀 與文的閱讀

徐雁 ■ 著

科學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书人、书理和“大阅读”观为基本立意，分为人文阅读的丰沛内涵、阅读推广的文化创意和“大阅读”的人文魅力三编。从阅读文化学的独到视角，对朱熹、陈汉章、鲁迅、林语堂、沈从文、萧乾、赵萝蕤、孙犁、曾祥芹、莫言等的读书生活做了学理上的阐发，对推荐书目、文学好书榜、传记佳作、“文学疗愈”、“读书与人生”、“耕读之家与书香门第”及“学习型馆员”与“学习型图书馆”等进行了研讨。

本书可供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参考，对于提升读者的阅读情义、价值观及其审美接受和终身学习能力大有裨益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 / 徐雁著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03-040722-1

I. 阅… II. 徐… III. 阅读辅导—研究 IV. G252.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9023 号

责任编辑: 刘 超 / 责任校对: 桂伟利
责任印制: 钱玉芬 / 封面设计: 李姗姗
书名题签: 林公武 / 封底篆刻: 任建玮


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4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: 787×1092 1/16

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: 19 3/4

字数: 450 000

定价: 120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愿书香飘逸吾土（序）

朱永新

（全国政协副秘书长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）

如果说人类的物质文明可以通过建筑、工具等物化的形态得以保存和延续，那么，人类的精神文明又如何保存和延续？如果说一个新生儿的身体可以通过乳汁、五谷得以发育成长，那么，孩子的精神世界又如何与身体一起茁壮？我认为，阅读，尤其是阅读经典，是实现上述目的的必由之径。

多年前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时，一句话使我刻骨铭心：“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，是我的教育信仰的真谛之一。”随着年岁渐长，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与日俱增。原来书籍是传承文明的桥梁，是延续文化的中介；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，必须始终与阅读相伴。



（序作者〈右3〉与本书作者徐雁〈右1〉在第3届“21世纪教育沙龙”上，2003年11月于苏州）

纵观世界各国，凡是崇尚读书的民族，大多崇尚人文精神，且生命力顽强。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，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。犹太亡国两千年之后，又能重新复国；复国之后，能迅速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；在流离失所中，诞生了马克思、爱因斯坦和门德尔松等无数杰出的思想家、科学家和艺术家；不仅在全世界富豪榜中人数名列前茅，而且在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也有惊人比例……犹太民族创造以上一系列奇迹，已有研究证明其重要原因之一，是犹太民族对读书的酷爱。正是爱读书，才使犹太人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民族；而热爱读书的民族，必定是一个不断进取向上的民族。

自古以来，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崇尚、热爱读书的民族。只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，才使得传统读书人的阅读视野渐渐狭窄化了。现在的应试教育，更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学生自由阅读的时间和空间，尤其是过早“文理分科”的做法，大大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：报考理科类的中学生早早停止了历史、地理等基础学科的学习，无法充分接受人文心灵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，固步于知识的单向度求索。这样的人，即使将来成为发明家、科学家，其人文情怀和人生境界也将会有重大缺陷，缺乏大胸襟、大情怀的科学家，最终必然难达高层次和高境界。

有鉴于此，自从200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提出设立“国家阅读节”的提案以来，我一直保持着把“全民阅读”作为国家战略、建议设立“国家阅读基金”、组建成立“全民阅读国家委员会”等呼吁。虽然许多建议至今仍未被采纳，但我们的呐喊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许多人的共识。“全民阅读”也首次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之中。

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，在为阅读鼓与呼的过程中，我从未孤单。许多有识之士一直与我同行携手，同声相应，江苏省政协常委、江苏省南社研究会会长、南京大学图书档案系教授徐雁先生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徐先生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。十余年前，我在苏州曾组织力量选编“新世纪教育文库”，想为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选择最优秀的图书。他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余光教授因联名主编过《中国读书大辞典》，自然成为首先确定的专家，由此两人同时走进了我的视野。自那以后，志同道合，交往日多，我逐渐了解到他们师兄弟在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界，素有“北王南徐”之称。王教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的知名专家，著述丰硕，而徐雁主编的《中华读书之旅》、《中国图书文化简史》、《全民阅读推广手册》和《全民阅读参考读本》，以及“华夏书香丛书”、“读书台文丛”、“书林清话文库”等，则是当代阅读学界的重要工具书和参考书。他个人的著作如《苍茫书城》、《书房文影》、《读书与藏书》、《旧书陈香》、《纸老，书未黄》等，尤其是早就出版的《中国旧书业百年》和即将问世的《中国古旧书文化史》等，简约的书名中都含有一个“书”字，可谓书香蕴藉，爱书若痴。

我还知道他另有笔名叫做“秋禾”，别署“雁斋”。以这两个名号出版的读书随笔，有《秋禾书话》、《秋禾行旅记》、《雁斋书灯录》和《江淮雁斋读书志》等，也多为读书人和藏书家们所喜爱。他先后开在“百度网”和“新浪网”上的博客，称为“秋禾话书”，被誉为“读书人的博客”，是一个播撒读书种子、推行书香风尚的重要网络园地。

作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（中国写作学会阅读专业委员会）的现任会长，徐先生在不断著书立说，在南京大学持续开设“阅读文化学”、“书评写作和理论”课程的同时，还应邀到全国各地院校、图书馆、出版社和机关团体作过百余场讲座，面授其与书为友的经验 and 研求书文化的心得，不遗余力地推广阅读，传播书香。在“人生唯有读书好”、“花香何及书香远”、“文学阅读与人的全面发展”等品牌讲座中，他对诸多中外名著进行深度解读，提出了“人贵有读书之志”，“左书右网，并行不悖；前语后文，流畅对接”，“阅读积累知识，知识造就文化，文化改良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”等一系列阅读文化命题，并加以深入浅出的阐述，深受听众们的欢迎。

无论是在著作中,还是在讲座中,或者在接受记者的访谈里,徐雁宣讲“悬疑解疑”、“结网式”、“提纲挈领”等传统读书法的要义,提倡“个人要有基础性藏书,形成自己的阅读结构”,呼吁一个“小康之家”,不仅要有“机房”(指电脑),还应建构好“书房”。他还在研求前人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和“读无字书,悟有字理”等哲言的基础上,提出了自己的“大阅读观”。对于“全民阅读推广”这个概念,他也有自己的认识,剖析了其中的三方面内涵:一是对社会群体来说,各行各业、各阶层都应该是阅读推广的对象;二是对个体来说,阅读是人生全过程的阅读,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具体形式,学了之后人生才有活力;三是对于图书馆、书店来说,是要对全品种的读物进行推广,它们所能拥有的所有图书资源都应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对象。

由书及人,因书为友,我和徐雁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才发现,我们还有许多共同之处。首先,苏州是我们共同的“文化故乡”,他出身书香浓郁的历史文化古城——苏州太仓(古称“娄东”、“镇洋”),那里我多次去过,是个地灵人杰的地方;他喜欢引用著名教育家、苏州名贤叶圣陶先生的诗句“天地阅览室,万物皆书卷”,而我则特别喜爱这位民进中央老前辈所说的“在现代中国做一个人,绝不可放弃充实自己,丰富自己的每一个机会”,并以此自励。作为我国统一战线的成员之一,我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中央副主席,而他历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、省监督委员会主任,在参政议题中,彼此都曾提出过如何有效地推进国民阅读的建议。当然,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出身,各自的专业和学问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,这一点更是我俩的共识。

不久前,徐雁告诉我他的一部新论集《阅读的人文和人文的阅读》,将在科学出版社问世,希望我能够为他新著写点文字。我自然乐于应命。从书名可知,这又是一部以“书”为主题,以推广全民阅读和阐发阅读内涵为宗旨的著作。该书基本上分为书人、书理、书事三大板块,作者以其独到的视角和新颖的见解,对朱熹、陈汉章、鲁迅、孙犁、萧乾、赵萝蕤、姜德明、曾祥芹、莫言等古今人物的读书生活进行了阐发,对鲁迅、巴金、莫言著作的流传作了读者接受分析,还探究了书目、文学名著、传记佳作、“文学疗愈”、诺贝尔文学奖图书与全民阅读推广的关系,充分表述并阐发了他的“大阅读观”,是他在阅读文化领域进行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探索的代表作。它资料丰富,文笔饶有情趣,可读性强,对于读者培养阅读情意,提升阅读品位,获得阅读启迪,大有裨益。

不禁联想到去年岁末,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评选2012年度四个“阅读推广机构”和四位“年度阅读推广人”,徐雁正名列“阅读推广人”首位。媒体给予他的“致敬辞”说:

“天地阅览室,万物皆书卷”,主张“因人阅读”理念的徐雁,多年来将专业学识服务于社会大众阅读需求,在认真做好“教书育人”的本职工作的同时,积极行走在任重而道远的全民阅读推广之路上。为着“通过全民阅读这种方式 and 手段,最终走向文化创意、科学创新和社会创造”的目标,徐雁始终奋力前行。

这番评介,徐先生当之无愧。他不仅是一个有才有学的“阅读推广人”,更是一位为建设“书香中国”且思且行的耕耘者。在本书定稿之际,欣闻中国图书馆学会在2013年年会上(上海浦东,2013年11月)把他举荐为“2013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”,这真是名

至而实归。

今年夏天，徐先生帮助组稿的我的文集《书香，也醉人》（海天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版）问世了，他在第一时间在《藏书报》上发表了书评加以推介。文章最后说，“我近年来在各地所作阅读推广的讲座或给读者的签名赠言中，喜说‘花香何及书香远，酒味怎如诗味长’，今日读到作者在题为《书自香我何须花》的本书后记中的自述‘茶亦醉人何须酒，书自香我何须花’，不觉莞尔。原来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自迷。最是书林君有癖，不恋花香爱书衣啊。”

看来我俩在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道路上真是神契意合多多。我愿继续与他同向同行，并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心声：愿做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，愿书香飘溢吾土，愿为全民阅读事业鼓与呼！是为序。

癸巳年春节于北京滴石斋

目 录

第一编 人文阅读的丰沛内涵

“智是知得到，圣是行得到”

——朱熹读书法的现在时分析

/ 3

“陈古典与要籍，邀赏识于群彦”

——毕生与书为友的国学家陈汉章

/ 7

“管他冬夏与春秋”

——鲁迅著作的读者接受、时政颠簸以及书文化余韵

/ 16

“读者的顾问，出版界的御史”

——知行合一地倡导图书评论独立品格的萧乾

/ 35

“圆满的自亮”

——解读北京大学教授赵萝蕤女史的才学人生

/ 43

从“知识奠基”到“文化给养”

——作为“终身学习者”楷模的孙犁

/ 68

“故作轩窗挹苍翠，要得弦诵答潺湲”

——曾祥芹的阅读观及对朱熹读书诗的赏评

/ 80

“读以致悦”与“学以致用”

——莫言读书经历对于读者的阅读文化学启迪

/ 86

“与其莫言热，不如文学热”

——基于“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”话题的阅读推广

/ 95

第二编 阅读推广的文化创意

“孔子圣人，其学必始于观书”

——一种读书情意和阅读价值观的建立

/ 107

“目录明，方可读书”

——推荐书目、影响书目、畅销书目与读物推广

/ 113

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

——全民阅读推广背景上的家庭书香氛围的构建

/ 120

“读书种子”的培育与图书的“可读性”问题

——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可持续性 / 144

温补人类心神的“十全大补丸”

——文学好书、经典名著与阅读推广 / 154

“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……”

——“文学疗愈”与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/ 161

“书爱众香薰，知识最乐群”

——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/ 192

时代理念·人文内涵·专业主义精神

——“学习型馆员”与“学习型图书馆” / 202

“丹桂有根，生于书香门第”

—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所推动的“书香都市”建设 / 217

第三编 “大阅读”的人文魅力

大阅读·深思考·高提升

——基于“阅读与人生”的一个主题报告 / 225

阅读“名人传”，汲取“正能量”

——传记佳作阅读的五个人文内涵 / 238

“花香何及书香远”

——中外文学经典名著阅读与文化传承 / 251

“在海的那一边，有一群蓝精灵……”

——一个有关读书和学习的主题讲座 / 259

人和·馆顺·书香

——和顺图书馆八十五周年发展历程之检讨和启示 / 268

“花香不及书香远，美味难比诗味长”

——《苏州大讲坛》第二集序 / 282

“长留千岁鹤，声远读书台”

——为常熟图书馆创办导读小杂志《读书台》作 / 284

[延伸阅读]“天地阅览室 万物皆书卷”

——秋禾师与他的人文阅读理念 / 287

“最是书香能致远”（编后记）

/ 300

“智是知得到，圣是行得到”

——朱熹读书法的现代时分析

第一编 ■ 人文阅读的丰沛内涵

对于散布在民间的士子们来说，只有通过科考，金榜题名，才可以获得科举功名的荣耀和仕途的广阔，从而成为官在朝，或者游四方，或为乡绅，举士一类人，算是读书人中“上座人物”。

在宋大子朱熹时代，科举考试的“官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颜如圣，书中自有颜如圣，书中自有颜如圣，书中自有颜如圣”的观念，早已深深植根于士子的心头。而雕版印书技术的普及，也使得书籍的流通不再局限于官府和藏书家，于是，“书中自有颜如圣，一半成名天下知”的功名梦，便成为了一代代士子的抱负所向。而其中的佼佼者，则以儒家文化的传承为己任，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张载（1020—1078年）所言，以文化的存亡绝续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第一大终极关怀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立文先生所著《朱子评传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，以45万字的篇幅，详尽地阐述了朱大子的精神家国的方方面面，可资参读。

一、“大抵学问只有两途，致知、力行而已”

在《朱子语类》卷一零四中，朱夫子曾自述其成长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，是在他十来岁时，读到《孟子·告子》篇中“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病之？圣人与我同类者”一节，顿悟了人皆可以为尧为舜为孔孟夫子的道理，从而奋发立志，立下了“圣人亦易做”的远大志向，直到晚年才感叹慨道：“乃觉得难”。

那么，一个读书人向做古圣贤人的目标努力进阶，“难”在何处呢？

在朱夫子看来，首先是“读书难”。假如说能识会读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能力的活，那么识文断字，则是一个人要领悟过后来的启蒙教育接受教育之后，才形成的的一种文化认知能力。而仅仅识文断字还不够，还必须要有透过字句洞察领悟圣贤道理的能力，这也就是朱夫子所要求读者追求的“语脉”。

他常以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例，指导学子读书门道，并现身说法道：

【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】须是方圣贤去看一番，将圣贤说的一句一句都理会过，直要见圣贤语脉所在，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，或者圣贤语脉都在中。

“智是知得到，圣是行得到”

——朱熹读书法的现在时分析

朱熹（1130—1200年）所生活的南宋，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“职业读书人”的时代。朝廷通过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的科举考试，来甄选并提拔符合其标准的优秀读书人出仕社会；对于散布在民间的士子们来说，只有通过科考，金榜题名，才可以获得较为高贵的官场地位和优渥的经济待遇。从此或为官在朝，或宦游四方，或为乡绅、学士、塾师，皆足以参与中、上层的社会生活。

在朱夫子的时代，宋真宗赵恒（998—1022年）所谓的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安居不用架高楼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；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；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”的观念，早已深得朝野人士的认同，而雕版印书技术的普及，使得民间富贵之家易于置书、读书和藏书。于是，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的功名荣华，便成为了一般宋代士子的抱负所向，而其中的佼佼者，则以儒家文化的传承为己任，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张载（1020—1078年）所言，以文化的存亡绝续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其人生的终极关怀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立文先生所著《朱熹评传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，以45万字的篇幅，详尽地阐述了朱夫子的精神家园的方方面面，可资参读。

一、“大抵学问只有两途，致知、力行而已”

在《朱子语类》卷一零四中，朱夫子曾自述其成长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，是在他十来岁时，读到《孟子·告子》篇中“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疑之？圣人与我同类者”一节，顿悟了人皆可以为尧为舜为孔孟夫子的道理，从而喜滋滋地立下了“圣人亦易做”的远大志向，直到晚年才忽发感慨道：“方觉得难”。

那么，一个读书人向做古圣贤人的目标努力进取，“难”在何处呢？

在朱夫子看来，首先是“读书难”。假如说能说会道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能力的话，那么识文断字，则是一个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启蒙扫盲接受教育之后，才能形成的一种文化认知能力。而仅仅识文断字还不够，还必须要有透过字句篇章领会圣贤道理的能力，这也就是朱夫子所要求读者追寻的“语脉”。

他曾以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例，指导学子读书门道，并现身说法道：

（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）须是著力至诚去看一番，将圣贤说底一句一字都理会过。直要见圣贤语脉所在，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，及看圣贤语脉因何如此

说。直是用力与他理会，如做冤仇相似，理会教分晓，然后将来玩味，方是见得意思出来……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一七）

某往年在同安日，因差出体究公事处，夜寒不能寐，因看得子夏论学一段（见《论语·学而》——引者注）分明。后官满，在郡中等批书，已遣行李，无文字看，于馆人处借得《孟子》一册熟读，方晓得“养气”一章（见《孟子·公孙丑》——引者注）语脉所在。

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零四）

道理星散在事物上，却无总在一处底。而今只得将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熟看。如《论语》上看不出，少间就《孟子》上看得出；《孟子》上底，只是《论语》上底，不可道《孟子》胜《论语》。只是自家以前看不到，而今方见得到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零）

朱夫子认为开卷读圣贤书，须识那字面背后的“理”：“读书须去里面理会，譬如看屋，须看那房屋间架，莫要只去看那外面墙壁粉饰。如吃荔枝，须吃那肉，不吃那皮……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。某自二十时看道理，便要看那里面”，“看道理，须是渐渐向里面寻到那精英处，方是。”

朱夫子的体会是：“治学难”。在《朱子文集》卷六十中，有朱夫子答朱朋孙的信，其中说：“夫学非读书之谓，然不读书又无以知为学之方，故读之者贵专而不贵博，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，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所得也。”

就治学而言，他曾经批评自两汉经学以来诸儒的风气道：

自孔孟灭后，诸儒不予细读得圣贤人之书，晓得圣人之旨，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。说得却也好看，只是非圣人之意，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……说得新奇巧妙，可以欺惑人，只是非圣人之意。此无他，患在于不予细读圣人之书。人若能虚心下意，自莫生意见，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，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，不待安排，不待杜撰。如此，方谓之善读书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七）

最后自然是“知易行难”。他说：“读书以观圣贤之意，因圣贤之意，以观自然之理”（卷一零），“圣贤之言，须常将来眼头过，口头转，心头运。”（卷一零）“大凡读书，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著力，方可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四十三），“盖为学之序，为己而后可以及人，达理然后可以制事”（《朱子大全》卷三十五）。而其终极关怀在于：

学者须是切己，方有所得。今人知为学者，听人说一席好话，亦解开悟；到切己工夫，却全不曾做，所以悠悠岁月，无可理会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一六）

学者最怕因循，莫说道一下便要做成。今日知得一事亦得，行得一事亦得，只要不间断，积累之久，自解做得彻去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一三）

这里说的是知书达理、躬行实践的问题。他认为：“智是知得到，圣是行得到”，“学之博，未若知之之要；知之之要，未若行之之实”，“若知不高，则识见浅陋；若履不切，则所行不实”，“知识贵乎高明，践履贵乎著实。知既高明，须放低著实做去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四）

他认为，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是，在求知得识的过程中增智长慧；而同时，用知识和智慧，付诸执行付诸实践，那么知识力与实践性、智慧性与执行力相得益彰，互补互益，一个读书人就可能超凡为“智者”，由“智者”而后“入圣”了！他说：“圣人也不是不理会博学多识，只是圣人之所以圣，却不在博学多识，而在一以贯之。”

因此，“智是知得到，圣是行得到”，是朱子读书法的前提。朱夫子论读书，常常是人生这一根本命题联系在一起。他说：“人生虚浮，朝不保夕，深可警惧，真当勇猛精进，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。”“人生诸事，大抵且得随缘处，勉力读书，省节浮费，令稍有赢余以俟不时之须乃佳耳。”

圣人比常人先明白而且彻悟了人生的本质性意义——人生不仅仅是为了百年之间的“倒计时”式生存，也不仅仅是要体面地生存，而且还要发展，有尊严地发展；人生的意义在于用自己有限的人生、财富、时间，去求索人类无限的未知空间；让自己的生命，对这个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构成的世俗社会有所贡献，让子孙后代生活得和谐幸福。或如张载所总结的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“大抵学问只有两途，致知、力行而已。”（《朱子大全》卷四十八）朱夫子是“边知边行”的“知行合一”论者，他主张知识是智慧的理性基础，行动是知识和智慧的人生实践。也就是说，朱夫子认为，由“知”而“智”而“行”，然后超“凡”脱“俗”入“圣”，是读书、治学、为人的最高境界。

二、“今人得书不读，只要卖钱，是何见识？”

“孔子圣人，其学必始于观书。”（苏轼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）须予注意的是，朱夫子定居之地建阳，与福建境内这一书业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。

朱熹曾说：“天旋地转，闽、浙反居天下之中。”他在《建阳县学藏书记》中说，建阳麻沙版书籍，“上自《六经》，下及训传，行四方者，无往不至。”说明在南宋时，他所长期读书教学所在的福建，在国家地域位置和文化传播中心上的变化。

比朱熹早出世半个多世纪的叶梦得（1077—1148年）就曾评说道：“今天下印书，以杭州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，但纸不佳。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售，故不能工。福建本几遍天下，正以易成故也。”（《石林燕语》卷八）而比朱熹晚生约半个世纪的刘克庄（1187—1269年）在担任建阳知县期间的印象是：“坟籍大备，比屋弦诵。”可见朱熹生活所在地，实际上正是南宋的知识传播中心之一。而因朱熹夫子的教学、导读、著述活动，又反过来训育了人才，促进了当地读书、著书和藏书风气的发展，推动了书业的进步。

朱熹这个祖籍徽州学者，对于福建的回报是巨大的。朱门弟子在福建多达164人，其中建阳就有99人。更可贵的是，在他的表率下，从此形成了作风上吃苦耐劳，学风上不尚空谈，学业上专心致志，学问上务求致用的优良的“八闽学统”。

朱夫子的学说，又被称为“闽学”。因为朱子学在福建的传承，所以八闽之地又曾经赢得了“海滨邹鲁”的美称，就如岳麓书院因为他的讲学而有了“潇湘洙泗”的美称一样——“海滨邹鲁”和“潇湘洙泗”是古代文教事业上一块至高无上的金字招牌，比之

现在风靡一时的“世界人文遗产”的国际知名品牌，其含金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来！

朱夫子一生共撰专著 26 种，编校编辑、单篇刻印的有 19 种，总其文字约有 2500 万，且得时代条件之赐，“其著作大多生前即有刻本”（徐德明《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》前言）。福建有学者指出：

由于朱熹在闽北大倡理学，并以书院为据点，建宁府书院林立，成为全福建路之冠，大兴藏书与著书之风气，为建宁府书坊提供出版资料和丰富稿源……且本地学校、书院众多，拥有相当数量学生，是书坊的可观读者群。

（林应麟《福建书业史》第四章）

朱熹刻书，一是为了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传播其学术思想，以及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、张、二程等人的著作，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；二是为了解决其所办书院生员的教学用书；三是为了弥补其俸禄之不足，维持生计。

（方彦寿《朱熹与考亭书院刻书考》第四章）

从而在主、客观两个方面为朱熹介入刻书活动找到了合理的解释。

朱夫子刻书，其初衷或有“刊小书板以自助”（张栻《致朱用晦》）的经济目的，也曾为《孟子集注》“为建阳人贩卖甚广”（朱熹《答郑子上》）而欣然，更或有意外之喜，如陆九渊门人彭世昌从江西来家造访：“问何故而来？先生以书院颇少书籍，因购书故至此。”（《宋元学案》卷七十七《槐堂诸儒学案》）

但此项事务，不时引发朱夫子的烦恼。除了“不告而刊”，即将其未定稿擅自刻书卖钱“煞误看读”和“闻有盗印者”两种情况外，他还曾慨叹：“今人得书不读，只要卖钱，是何见识？苦恼杀人，奈何，奈何？”（朱熹《答廖子晦书》）可见朱熹夫子在南宋那个以本逐利的图书市场中，也未能幸免于两难。

“陈古典与要籍，邀赏识于群彦”

——毕生与书为友的国学家陈汉章

陈汉章（1864—1938年），出生于浙江象山县东陈村一个世代耕读之家（图1）。他7岁入私塾启蒙，后入学丹山、缨溪书院。识字对课，受业开笔，进而吟诗作文，逐渐表现出聪颖好学的“读书种子”的特点。23岁时，到杭州“诂经精舍”（亦称“俞楼”），入著名经学大师俞樾（1821—1907年）门下。一年后，又至宁波黄元同“辨志精舍”问学。

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陈汉章到杭州参加乡试中举。两年后，他赴京城参加清廷礼部会试，不幸名落孙山。遂以未能中进士，被皇帝钦点为翰林为憾。但他读书治学之志不稍馁，勤览群籍，专心研学。自弱冠至而立，十年间披阅经、史百家旧籍几及万卷，且考据多有心得，著述数十卷，逐渐成为了名著学林、受人尊崇的国学家。

陈汉章与俞楼同门章太炎先生（1869—1936年）之志在民族革命，为学偏重古文异趣，但其学问却为章氏倾心钦服，两人一直保持着信来笺往的联系。



图1 陈汉章（1864—1938年）

按：陈汉章年长太炎五岁，在俞樾门下的资历比章太炎早两年，他们服膺的都是开汉学（朴学）先声的学者顾炎武（1613—1682年）。章氏尝于一

通书信中表示：“浙中朋辈，博学精思，无出阁下右者。”据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英才考证，该信件当写于清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“是汉章离开诂经精舍三年之后，章太炎入读诂经精舍第二年时。”他认为章氏做出如此夸赞的原因，大概是他看到了汉章在俞氏诂经精舍的课艺文字或其他文章，还听说了同门师兄的口碑称道，“总之，章太炎对汉章有一定的了解，才会写这样一封信，并有这样高的评价。”^①

顾福漕在《忆陈汉章老伯》中感慨地说：“余有次单独与庆麒兄相谈多时，他并告诉余，老伯已写成国学三本手稿，一本手稿用红格纸写，至少有三百多页，现在正在写另一本国学，内容如何不得而知……有一次，余与老伯谈及国学事，他说及与另一位有名之国学大师章太炎者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拿出信件给余看。余读过多封之后，（见）在往来信

^① 钱英才：《国学大师陈汉章》，钱英才：《国学大师陈汉章》，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7：48-50

件中所写之字，个个正书，未有一个带草者。由此可知，国学大师对于所写之字，如此端正，真是难得一见之事也。”^①

刘操南（1917—1998年）指出，顾炎武身处清代汉明的鼎革易代之际，乃以继绝学以至复故国自任。因而在为学处世上，主张“博学于文”（出自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、“行己有耻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以“明六经之旨”、“通当世之务”和“兴太平之事”为旨归。但在清初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和文化专制下，无论“吴派”还是“皖派”的朴学家，最后都被迫走入了为治学而治学的“狭径”，渐忘“明道救世”的来路：

逮乎清季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，学者感于清廷封建统治危机严重，学术研究初由“古文经学”转向“今文经学”……借助经学以批评时事，为“改良派”政治主张服务。余杭章太炎起，深憾“改良派”为革命之阻力，政治思想由“改良派”转为“革命派”。学术思想以“古文经学”来反对“今文经学”，以“革命”反“改良”，倡导“反满”，恢复顾氏“行己有耻”的抗清意识，以其革命实践，予以新的内容……（陈汉章）先生之学，冀欲阐明汉儒“今文经学”，以应世变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。治学方法就近言之，实导源于顾亭林之“博学于文”与“行己有耻”，先生之学可谓“博学于文”矣。

乾嘉学者戴东原师承江永，衍习西洋弧矢算学，撰《句股割圆记》，谓言古已有之。此一心态，学术界有其市场。先生言泰西若干科学发明古已有之，藉以回护民族意识，提高民族自信心，谅亦受此影响。此亦为先生理解顾氏“行己有耻”之一种表现。时贤或以“怪人”视之，此论未足以阐述先生之学也。^②

陈汉章自谓至18岁，方知经、史、子、集读法。后参郡试，得考中秀才，排序为第十一名。回家后，感到学问空疏之人“不足为国家用”，于是矢志于四部书中用功，诵读弗辍，规定自己每日读书尽经五卷、集五卷。其子陈庆麒、陈庆粹在《先考行述》中说，其父“好学深思，由博返约，有不同于浅陋之士者”，“开卷有得，辄记录之，积久而著作等身”。尝自我总结生平治学之“三变”云：

一、青年时代，“肄业俞楼，事德清俞曲园先生。后以汉学文，应辨志精舍季课，问业于定海黄元同先生，尽取汉、唐以来至清先儒说经订史之书而毕读之，知考据之学至难，虽大儒亦不能无失。病乾、嘉诸君子之蒞程、朱，兼治汉、宋而不偏于一家”；

二、至于中年，“鉴于国家多故，默念知己知彼之论，乃取当时所出算术、格致、农学、兵学、外交诸译著，一一加以研讨，冀于致国富强之术有所贡献”；

三、其后，“鉴于清廷变法多枝节为之，而欧风东渐，异说并兴，人心浸己不正，于是深惟‘经正民兴’之义，仍返求之于经学，穷年兀兀，虽老髦而不少懈。”^③

近代著名诗人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陈衍（1856—1937年）曾谓陈汉章为“乾嘉诸老畏友”。何志浩教授（1905—2007年）在《陈汉章先生传》中则称赞道：“先生一生

① 顾福漕：忆陈汉章老伯//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经史学家陈汉章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7：29

② 刘操南：从中国学术传统略述陈汉章先生经史考据之学//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经史学家陈汉章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7：91，102

③ 陈庆麒，陈庆粹：先考行述//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经史学家陈汉章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7：51